

承前启后: 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

潘 崇

【摘要】 1866年瞻对赏藏及其后收归川属是清末川边史上的重大事件。1896年,川督鹿传霖率先筹瞻川属,因清廷反对而功败垂成。随着英国在1903年第二次入侵西藏,清政府终于一改此前反对收瞻之旨,谕令川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及帮办大臣夙全筹瞻川属,此时锡良态度模棱两可,夙全力主之,有泰则坚决反对,长达半年之久的争论终致筹瞻无功。1905年初夙全被杀后锡良开始用兵巴塘,对此瞻对藏官则直接出兵干预,锡良意识到筹瞻川属势在必行,遂在巴塘战事结束后力主收瞻,但因他地乱事丛沓而未及实施。直到1906年6月清军攻克桑披寺川边战事暂告一段落后,锡良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改土归流大幕拉启的时代背景下,时任川督赵尔丰终于在1911年将瞻对收归川属。从清末瞻对问题的连续性审视,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虽未实现,但以锡良为首的地方官员关于筹瞻川属的谋划和举措以及锡良筹瞻态度的变化,彰显出筹瞻川属已是川边内外交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客观上在鹿、赵之间构筑了联系的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 锡良; 瞻对; 改土归流; 新政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5)03—0077—09

【作者简介】 潘崇,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 455000

瞻对位于川边藏区中心区域,纵横数百里,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故又称三瞻。其地“东连明正、单东、麻书、孔撒、章谷五土司之界;南接里塘、毛丫、崇喜三土司之疆;西北与德格土司毗连”^①,界于川藏南北两条大道之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瞻对在清代为多事之区,自雍正以迄同治,历朝皆有乱事发生。同治四年(1865),达赖喇嘛派藏兵会同清军平定瞻对土司工布郎结起事,清政府遂于十二月十四日(1866年1月30日)将瞻对赏给达赖喇嘛管理。^②然而,瞻对赏藏后川边非但没有趋于安定,反因西藏地方当局介入愈成肇乱之源。正如川督锡良所观察,达赖派往瞻对的藏官“只知有藏卫,不知有国家”,治瞻苛虐且横行川边。^③与此同时,川边藏区的一些土司、喇嘛,鉴于清政府国势衰弱,川边统治空虚,日渐产生离心倾向,“土司则惟务苛虐,喇嘛则专事凶残”。^④总督川政之贤能者,出于保藏固川的目的,意识到筹瞻川属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

筹瞻川属作为清末川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川督鹿传霖,终于川督赵尔丰,中间历锡良督川时期之谋划,前后持续15年之久。光绪二十二年(1896),瞻对藏官率兵干预朱窝、章谷土司争袭案,川督鹿传霖檄兵讨之,三月而全瞻尽服,乃议收抚其地,改设汉官、划归川属,以为保川图藏之

① 傅嵩林《西康建省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元年铅印本影印,第75页。

② 学界对清代历朝用兵瞻对以及瞻对赏藏由来的研究较为充分,可参见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二)(三),《西藏研究》1986年第1、2、3期连载;任新建《清代的瞻对问题》,贾大泉主编《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178页;张秋雯《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川边瞻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年第21期;张秋雯《清代嘉道咸同四朝的瞻对之乱——瞻对赏藏的由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期上册。

③ 锡良《官军攻克桑披逆番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5页。

④ 《建昌道禀报巴塘肃清请奖各员弁文》,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5册,甲37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馆藏”)。

策。“会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交章言其不便，达赖复疏诉于朝，廷议中变，鹿传霖终解职去。”^①此外，鹿传霖亦曾筹划将德尔格忒、章谷、朱窝、巴塘、里塘等土司管辖地域改土归流，由于解职事亦俱废。史家吴丰培称，鹿传霖保川图藏“能观阙成”，则西康改省“早实现于十数年前”。^②十数年后，宣统三年（1911）时任川督的赵尔丰率兵入瞻，逐走藏官，瞻对问题卒以收归川属、改土归流告终。目前学界关于鹿、赵筹瞻川属的研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③但从筹瞻川属的连续性着眼，学界对两人之间相关官员筹瞻川属的举措及成效并无涉及，处于时段性学术“断层”。这种状况的产生，大体有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与鹿传霖之后数年内相关官员并无多少作为、川边改革一度陷于沉寂有关。鹿传霖之后两任川督为奎俊、岑春煊，但二人在川边并无多少建树。^④文海之后历任驻藏办事大臣为庆善（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擢，未到任）、裕钢（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擢，任至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有泰接任），前者赴藏途中因病出缺，后者虽久仕边吏，然而“懦弱无能”，对于强邻逼境、交涉日繁疲于应付，“动辄失宜”。^⑤其二，学术视野的局限。事实上，鹿传霖之后的川督并非皆碌碌之辈，新政时期出任川督的锡良（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至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在任）即是一位在筹瞻川属问题上作出重要贡献但又被我们忽视的关键人物；其三，史料挖掘不充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收藏有完整的锡良档案，其中《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等数十册档案史料，保存了锡良、有泰、凤全、赵尔丰、刘廷恕等人逐日往来电报，详尽展示了锡良以及其他相关官员筹瞻川属的诸多细节，锡良本人的心路历程亦得到充分展现。^⑥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收藏的锡良档案，综合其他史料，试图系统探讨锡良督川时期以其为首的地方官员关于筹瞻川属的谋划和举措，尤其注重探讨地方官员的往来讨论以及央地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展示清末川边复杂的政治生态以及川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 观察中渐进：锡良督川初期的川边施政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锡良出任署理四川总督，七月十六日抵达成都。他在七月二十日汇报接篆日期折中强调课吏、练兵、筹款、节用为施政重点，次者为学堂、警察、机器、工艺局，并未特别言及川边施政举措。^⑦几乎与锡良至川同时，7月间英国军官荣赫鹏借口两名潜入西藏的间谍被抓获，指挥军队在康巴宗附近抢掠藏民牛羊200多头，又无理要求驻扎甲岗、左喇嘛、罗那克处藏军撤走。9月2日，荣赫鹏又请求印督添拨100名士兵增援入藏英军，蓄意扩大事态。^⑧鉴于西藏边防危急，清政府于七月十五日即锡良抵蜀前一天颁发上谕：

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

①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4册，第271—272页。

② 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③ 参见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年第29期；朱悦梅《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西藏研究》2012年第5期。探讨赵尔丰川边改革的研究颇多，兹不一一列举。代表性研究当数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该文最早引用川滇边务大臣档案资料。

④ 奎俊在川督任上四年多时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一日），然素无政声，有记载称其“多行不义，阴济其贪，驯至吏治不修”，并揭露其侵吞赈款。参见老吏《贪官污吏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岑春煊任川督半年多时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一日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主要精力放在攻剿义和团、哥老会起事上，同时推行创办警察、编练新军等新政举措，对于川边似无多少作为。参见戴琛《岑春煊》，林增平、郭汉民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245页。

⑤ 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75页。

⑥ 档案中多有“夷”、“逆”、“匪”等带有侮辱色彩的词汇，为清政府惯用称谓，笔者引用时不予更动，特此说明。

⑦ 锡良《恭报到川接篆日期折》，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锡良遗稿》第344页。

⑧ 参见黄鸿钊《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

奏。^①

正如有论者言,上述举措虽未明言改变川边土司制度,但实际上意味着新政时期清政府谋划推行川边改土归流的开端。^②对于清政府以缓进方式推行川边改革的思路,锡良之回应亦是颇为审慎。经过调查,锡良了解到川边气候恶劣不适宜种植,以茶叶为大宗的商业活动亦仅运至打箭炉而止,开矿更是受到各土司以“神禁不可犯,祖训不可违”为辞的抵制,权衡之下唯有择地垦殖较为可行。锡良遂督派粮务委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在巴塘开办垦殖,拉开了清末川边新政的序幕。巴塘地处金沙江河谷,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川边主要产粮区,也是列强重点渗透的区域。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英、美等国传教士纷至巴塘等地建立教堂、肆掠土地,如美国在巴塘的教会即掠夺了近200亩土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美国传教士又在巴塘以年租170藏洋和39年的期限强夺55亩土地。^③显见,锡良派员在巴塘垦殖亦有争回垦权的意图。锡良的整体思路是,以巴塘垦殖为试点,渐次推广他处及其他门类,“他处如能耕,推行较易,牧政、矿政又当次第考求”,最终实现“保藏固川”的目的。^④

二吴至巴塘后,责成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礼保以及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将拟开垦之地划出,两土司“乐从其事”,但丁林寺以所管土地仅有牧场并无可垦荒山荒地为由抵拒。二吴认为巴塘“三曲宗”已有正副土司赞成,“有其二不患无一,尽可次第办理”,拟具开办巴塘垦务章程十二条。^⑤但接下来的垦殖并不顺利,到光绪三十年(1904)底二吴将前招垦夫128名酌留20名,余均于十一月六日停工遣散。^⑥然而,锡良对于巴塘垦殖不力并无应对举措,更无强力推行的打算。事实上,锡良派员至巴塘垦殖源自清廷指令,且主要目的似乎不在垦殖本身,而是借此了解川边局势。

除巴塘垦殖外,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奏请将原雅州府属打箭炉升为直隶厅,改隶建昌道,以便管理关外土司,尤其强调此举实为针对瞻对:

自瞻对划归藏属,番官侵暴,川边土司弱者慑其威而甘于输纳,强者怙其势而恋为奸横,几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匪惟蛮触纷争,抑且弁髦王章,轻侮边吏。巴、里塘粮员又以隔川过远,上司耳目难周,非庸儒以求苟安,即猥琐以盈溪壑。……莫若将打箭炉同知升为直隶厅,迺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管辖如故,巴、里塘粮员等官,改归该厅察举优劣。^⑦

地理位置上看,打箭炉、里塘、巴塘东西分列,皆为川藏官道之要冲,打箭炉升为直隶厅实为加强川边控制之举措。同日,锡良又上《敬举边才以备任使折》,鉴于“雅州等府所辖番夷种族繁多,其地荒阔、其人愚犷,争衅时时并作”,认为“得健吏治之”方能“慑强梗于无形,塞萌芽于初起”,由此奏请授予打箭炉同知刘廷恕道府衔,以重职任。^⑧

锡良督川之初,一方面需要全面了解川边局势,另一方面鉴于鹿传霖筹贍川属功败垂成的前车之鉴,因此其推行的无论是巴塘垦殖还是打箭炉升为直隶厅,皆是经营川边的缓和举措,显见他并不愿贸然打破政府与川边地区土司、寺院之间达成的平衡。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② 参见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转引自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④ 锡良《议覆川边屯垦商矿各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第365—366页。

⑤ 《吴锡珍都司吴以忠会禀锡良拟订办垦章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巴塘地面三股势力集团俗称“三曲宗”,正土司为第一曲宗,副土司为第二曲宗,丁林寺为第三曲宗。

⑥ 《巴塘粮员吴令锡珍禀凤大臣委员会办垦务开工情形暨喇嘛番匪抗御官兵烧毁教堂垦房文》,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牒》第1册,甲374—8,馆藏。

⑦ 锡良《打箭炉升直隶厅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第369页。

⑧ 锡良《敬举边才以备任使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第372页。

二 争执中流产:光绪三十年筹瞻川属之争论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在侵占拉萨后胁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进而利用班禅和达赖的矛盾拉拢九世班禅,“怂令班禅回藏,滋生事端”,彼则借口保护进兵,从而实现控制西藏的阴谋。^①曾任川督的鹿传霖眼见西藏势危,于八月五日吁请速将瞻对收归川属,否则“一经英人清界,“瞻必属英”。”^②但是,清政府对于鹿传霖之议不置可否,而是在八月二十四日首先颁布派遣各员经营边地的上谕:

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救补。……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着凤全(驻藏帮办大臣)认真经理,北至青海一带,着延祉(西宁办事大臣)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③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此前反对筹瞻川属的清政府鉴于川边日甚一日的危急形势,加之鹿传霖的奏疏,终于意识到筹瞻川属的重要性,遂颁布筹瞻上谕:

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等语。著锡良、有泰、凤全察情形,妥议具奏。^④

显见,《拉萨条约》逼签近两个月之后,清政府才接纳此前被搁置的鹿传霖筹瞻川属之议,对于西藏边防危急回应之滞后可见一斑。时论即评“政府于事前置若罔闻,直至草约告成,由驻藏大臣电告政府,始矍然思补救,抑已无及。”^⑤此时锡良鉴于川边形势复杂,对是否应将瞻对收归川属并未仓促回应,而是经过和驻藏大臣有泰、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以及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副将陈均山等人长期的往来协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方有明折上奏。

光绪三十年四月七日,清政府任命四川候补道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十月二十二日,凤全从打箭炉起程赴藏,由于“山路大雪”,到十一月十八日才行抵巴塘。^⑥凤全在途次接到筹瞻谕旨后即致电刘廷恕、陈均山,强调“收瞻固边,事举宜速”,后者将此意转至锡良,同时汇报瞻对头人及川边各土司遵否难料。^⑦由于收瞻前景不明朗,锡良回电中不无模糊地表达了“不可延误事机,亦不得孟浪下手”之意。^⑧在致凤全电中也强调须对瞻对番官“相机利导”,由西藏调回瞻对番官“事务方顺”。^⑨

十一月十五日,长期在打箭炉任职的刘廷恕、陈均山基于对瞻对情事的认知,加之收到凤全“事举宜速”的电文,遂致电锡良借达赖出藏之机,直接出兵瞻对将其收归川属:

凤大臣经画于外,有大臣筹议于内。达赖弃藏远逃,已觊名号,大失人心,收瞻以固藩篱,一势以图善举。藏至瞻四千余里,炉至瞻六百二十里,辅车相依,见机利导,副将等先谕番官并饬各路土司,务使通国皆知彼各离心解体。^⑩

所谓达赖出藏,指英军兵临城下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出走拉萨之事,十三世达赖喇嘛亦因此被清政府褫夺封号,其事则源于有泰之奏。有泰屈服英国之兵威,在英军攻占拉萨的当日即前往拜访英军将领荣赫鹏,并以牛羊犒其士卒。荣赫鹏借机利用有泰出面压服藏

① 《张荫棠驻藏奏稿》,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4页。

② 《军机大臣鹿传霖致外务部筹办瞻对疏节略》,光绪三十年八月五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第168页。

④ 《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年九月戊戌(二十三日)。

⑤ 沧江《西藏戡乱问题》,《国风报》1910年第4号,第30页。

⑥ 《打箭炉刘丞廷恕来电》,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⑦ 《打箭炉陈均山刘廷恕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⑧ 《复陈均山刘廷恕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⑨ 《致凤全大臣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⑩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人,以期订立对英国有利之条约,并借以促成清政府与西藏关系更加恶化。之后有泰则斥令噶厦接受英国要求,同时又思乘机推倒十三世达赖。^①有泰致电政府即言,十三世达赖“背旨丧师,拂谏违众”,英军逼近后不思挽回,“遁迹远扬”,是中英战事罪魁,请褫其名号。^②清政府听其言,于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由班禅暂摄达赖职权。实际上,有泰作为驻藏大臣,对于拉萨失陷亦难辞其咎,事后他也遭到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弹劾。

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藏并非刘、陈所言“弃藏远逃”,所谓“已薨名号,大失人心”更是言过其实。有论者即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领袖,曾组织全藏人力物力坚决抗英,在英军攻入拉萨之际为避免被胁迫签订条约而秘密出走,经藏北、青海、甘肃,于十月到达库伦。达赖出走不能简单地以叛国视之,其目的之一“是想直接向清政府禀报西藏近况,以求得清政府对他领导的抗英斗争的理解和支持”。^③锡良意识到达赖出走有着复杂背景,非如有泰以及刘、陈所言的临阵脱逃所能概括,因此断然否定了刘、陈所提趁达赖出藏之机出兵收瞻的建议,并严厉批评了二人的急躁冒失,再次强调筹瞻川属“机关不在瞻而在藏”:

收瞻之举,诚所至愿,惟其机关不在瞻而在藏,总应俟有大臣妥筹通计,咨覆到日再行宣布招徕。盖此事必须通盘筹画,节节疏通,方能善其后。若遽而轻举,或有出而干预,转恐难于收拾。该将、丞既经禀请风大臣咨藏善办,本部堂亦早咨商两大臣,仰即静候会商示遵,毋得稍涉冒昧,致贪近功而忽远虑,切切!^④

可见,锡良筹瞻川属的策略是通过有泰与藏中协商,进而由西藏将瞻对藏官调回。然此时将至巴塘的风全为经营川边计力主收瞻,屡电刘廷恕、陈均山“催办瞻事”。^⑤但刘、陈由于得到锡良指示,态度亦有变化,在复电中复述锡良意见,提出“由藏下手情势既顺”,建议风全游说有泰“迅决机宜”。^⑥而此时有泰忙于与英国侵略军接洽苟安,担心筹瞻川属引发藏中动荡而坚决反对,声称此事“不独于事理之反复”,更易“启藏番轻视之心”,“适以坚趋向外人之意”。^⑦

十二月初三日,刘廷恕、陈均山鉴于达赖被褫夺封号,又建言锡良与有泰筹商,飭令商上番僧等遵议瞻对归川、达赖回藏,认为“乘此机势,名正言顺,其时不可失矣”。^⑧其意在于,如果能迎请十三世达赖回藏,必然会得到达赖以及西藏僧俗对瞻对还川的支持,这正是他们向有泰提出的“筹瞻三策”之首策“瞻对归蜀,达赖复元,一策:查酌旧案,给款收瞻,二策:冥顽不灵,设法智取,三策。”^⑨显见,三策皆未涉及兵事,是对此前提出直接出兵瞻对的重大改动。十二月五日,刘、陈又向锡良汇报瞻对番官四郎降泽对瞻对收归川属的札谕“颇为恭顺”,并转述其言“如此札谕,好歹总要分清汉夷均是一视,现在小的传头目百姓等商议,愿归何处管理抑或如何体贴随时禀明。”^⑩从上述各电可以看出,长期在打箭炉任职的刘廷恕、陈均山对于筹瞻川属颇为焦虑,他们提出的首策无疑是最佳选择,然而遗憾的是锡良对此仍无明确回复。

十二月十九日,即风全抵达巴塘整一个月之际,又致电锡良请会衔上奏,请旨使达赖献还三瞻。^⑪但锡良仍未答复。在这种情势下,风全遂单衔上奏,一方面继续强调瞻对本川省藩篱,“收还

① 参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8—150页。

② 有泰《致外务部电达赖潜逃乞代奏请旨褫革其名号电》、《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据实纠参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190、1194页。

③ 马连龙《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④ 《复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⑤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⑥ 《致风大臣电》,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6册,甲374—20,馆藏。

⑦ 《驻藏办事大臣有密咨驻藏帮办大臣凤不便收回三瞻文》,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⑧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三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⑨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八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⑩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五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⑪ 《风大臣自巴塘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实保固根基”；另一方面则稍改此前筹瞻川属“事举宜速”的态度，其言“达赖去藏，未知定在，商上无主，因而推诿迁延自在意计之中。奴才惟有静以待之，一面选派晓事土人前往瞻地探明道路，且觐番官瞻目向背，以便相机因应。”又言“应请飭下办事大臣有泰设法开导商上，早为定议，迅赴事机。”^①显见，此时凤全与锡良筹瞻川属的态度渐趋一致。

事实上，瞻对番官的态度并非如刘、陈此前汇报的“颇为恭顺”。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廷恕、陈均山又报，声称瞻对番官因“虑藏信延宕”而态度有变，因请锡良速发打箭炉经费二万两以期“智定”，^②这正是此前刘廷恕提出的收瞻第二策，即“给款收瞻”。同时奏报计划亲自带领勇队前往瞻对办理。^③时隔不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日，刘廷恕又奏报锡良，再次强调瞻对番官“虑达赖回藏事后反覆”，必俟藏中檄调始肯离瞻，因此“须得有钦差、达赖、商上藏文印信”，并因此打消亲往瞻对办理的计划，认为“去瞻无济”不如“静听藏信”。^④锡良对于刘廷恕策略之反复以及奏报瞻对番官的态度“前后两歧”甚为不满，在回电中直言诘责“忽称番官须候藏信遵行，该丞去瞻无济，又谓此瞻夷实情。……前后两歧，殊难深信。……查该协丞夙称熟悉夷情，又非不明大局，何以前后所禀矛盾至此？”^⑤正月四日，刘、陈致电锡良，“冒罪直陈”正是由于指令不一致使他们这些执行者无所适从：

奉电谕，曷胜惶恐！卑职等能用智谋前往，无非给番官、番兵经费赏需，从善办理。奉凤大臣催飭速办，取结实稳慎而行。迭遵宪饬重顾机局，不用兵又不用款，卑职力不及此。……事至今日，只候有大臣藏议定妥，咨达大帅。^⑥

二月十五日，刘廷恕、陈均山再次致电锡良直抒胸臆，慨言“不同心事难着手，时艰浩叹”。^⑦事后刘廷恕更是指责锡良于筹瞻川属“心无主宰”、“托诸空言”。^⑧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此时距清廷颁发筹瞻川属上谕已近半载，锡良上《覆陈筹议收瞻折》，提出“经营边徼自以收瞻为急”，在具体策略上则基本认同了刘廷恕“给款收瞻”之策“敕下有泰宣布圣主绥边经远至意，明白开导，务令商上人等缴回瞻地，调回瞻官，立即赏还从前兵费银二十万两，由川筹解。”^⑨四月二十一日，反对筹瞻川属的驻藏大臣有泰认为锡良并未全面论述筹瞻川属的可行性而“为收三瞻请圣裁”，“不论可否，断语不下……滑之至一笑”。^⑩

由于各方意见严重分歧，光绪三十年的筹瞻川属以无果告终。但锡良通过参与筹瞻讨论，明确意识到筹瞻川属极大触动了瞻对藏官以及西藏地方的神经“藏中密谕瞻番修备兵戎、严防碉隘，盖恐川师之潜袭。”锡良亦由此得出重要认识：筹瞻川属单纯依靠晓谕番官这一“理喻”之策“徒损威重而已”终赖军事“力取”，所谓“川省陈师鞠旅，何难一奋戈铤”。^⑪通过军事途径解决瞻对问题的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锡良处理川边突发事件的策略选择。

① 《凤全遵旨议复收瞻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39—40页。商上，指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属于主管行政事务方面各机构的总称，普通意义就是指“噶厦”，总揽西藏一切政权。

②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③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④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⑤ 《覆打箭炉陈均山刘廷恕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⑥ 《打箭炉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四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⑦ 《打箭炉刘廷恕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锡良督川时办理泰里巴塘事宜电稿》第1册，甲374—144，馆藏。

⑧ 刘廷恕《颠末自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资料选编》，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⑨ 锡良《覆陈筹议收瞻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七日，《锡良遗稿》，第470—471页。

⑩ 有泰撰，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制，第169页。

⑪ 《覆陈筹议收瞻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七日，《锡良遗稿》，第471页。

三 兵事与善后: 巴塘战事结束后筹瞻川属之重提

光绪三十一年初,泰凝事件、巴塘事件接踵发生,以锡良为首的四川地方官员开始了对川边土司、喇嘛之用兵。筹瞻川属由于清政府对川边采取军事行动而暂时搁置,亦随着清政府军事上的得势而重被提上议事日程。

光绪三十一年初,清政府开办泰凝金矿时遭到该处喇嘛造谣抗拒。刘廷恕认为“此处矿务必须办成,以后各处始可接办”先后饬令靖边土弁张锡泰、管带张鸿声、都司卢鸣扬前往镇抚。^①二月十日,张鸿声行至距泰凝二十里的角达岭,遭到数百喇嘛攻击,遂退扎中板坝,泰凝乱事由此发轫。^②此为锡良出任川督后川边乱事之开端。紧接着,三月一日巴塘又发生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杀事件。^③上述事件的突发中断了筹瞻川属的进程。泰凝事发后,锡良派四川提督马维祺至边。三月十七日,经过三昼夜持续作战,清军攻克泰凝。^④巴塘事变的处理则更为棘手。凤全被杀后乱局迅速由巴塘向川边广大区域蔓延,“远近骚然,非特逆焰益张,边徼各僧番群且觊此为向背”。^⑤尤其是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联络一气,巴塘、瞻对共二三千人麇聚距里塘五六十里之金洞子,毛丫土司、乡城桑披寺“俱助乱”。^⑥马维祺在对锡良的汇报中,尤其强调瞻对藏官对巴塘事务的严重干预:

巴事起后,三瞻响应,番情为之一变,因泰凝堪布亦系藏派出,有所恃,已分饬南北两路汉土兵勇稳扎,联合里塘。^⑦

又言:

巴番串同三瞻、三岩各番,有将巴、里塘汉人洗尽之说。番兵已抵里塘,现在里塘文武已还向中渡等语。^⑧

四月八日,外务部致电有泰,要求审度时机安抚藏中。^⑨锡良亦电请有泰“谕藏禁瞻助逆”,同时晓谕三瞻番官不得干预巴塘事。^⑩马维祺则派把总马瑞麟赴中瞻、桑披、三岩等处剖切开导,此时瞻对藏官为堪布坚参,其派人至炉递呈夷禀,“词极恭顺”。^⑪然而事实上,瞻对派出八百余人前往巴塘。^⑫瞻对藏官“词极恭顺”实为假象,其反复无常表露无遗。

瞻对藏官直接派兵大肆干预川边事务,背后彰显的是清政府对西藏统治力的衰弱以及后者离心倾向的加剧。道光以降,中朝大吏漠视边务,驻藏大臣多庸碌之辈,“罔悉藏情”,以致藏人藐视公命。^⑬至光绪年间,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几近崩溃,驻藏大臣权力不断削弱,清廷威望亦随之渐失,尤其1888年第一次抗英战争失败后西藏僧俗对清廷极度失望。^⑭新政时期,外患的不断加剧不仅使西藏边防形势恶化,其策反手段也助推了西藏的离心倾向。如俄国在英国第二次侵藏之际,眼见藏

① 《打箭炉刘丞廷恕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四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7册,甲374—21,馆藏。

② 《打箭炉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8册,甲374—21,馆藏。

③ 事发原因及过程参见张秋雯《清末巴塘变乱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年第10期;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

④ 《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9册,甲374—21,馆藏。

⑤ 锡良《请给明正土司总兵衔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六日,《锡良遗稿》第491页。

⑥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9册,甲374—21,馆藏。

⑦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9册,甲374—21,馆藏。

⑧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9册,甲374—21,馆藏。

⑨ 《发锡良电为办理巴塘番匪作乱事》,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八日,2—03—12—031—02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⑩ 《晓谕关外未经附逆之僧土人等勿得轻听助逆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甲374—8,馆藏。

⑪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10册,甲374—21,馆藏。

⑫ 《炉城赵道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11册,甲374—21,馆藏。

⑬ 参见吴丰培《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⑭ 参见马连龙《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第241页。

人素嫉英人,遂“暗勾藏番,许以有事救护”,“藏番遂恃俄为外援”。^①而清政府褫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之举,更是激化了西藏地方以及达赖喇嘛与清政府之间原已有之的矛盾,遭到西藏僧俗激烈反对。

锡良自然明白,只有成功将瞻对收归川属,才能确保川边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离心倾向也是有力打击。由此,锡良在巴塘事发后力主施以重兵,其意不仅仅在于打击巴塘土司、喇嘛势力,更在于俾使巴塘用兵具有全局威慑力,以期整个川边乃至西藏畏威怀服。六月二十四日,马维骥部攻克巴塘,之后赵尔丰抵巴塘,马维骥回省。随即,锡良、赵尔丰相互配合,抓住兵事得势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奏请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锡良即强调“改革之便,计无逾于今日者”。^②另一方面,锡良改变此前筹瞻川属需驻藏官员与西藏地方协商的主张,认为“收瞻之举诚不可失时”。^③赵尔丰对此亦颇为认同,提议借兵事之利“谕藏还瞻”,此策不果再由川声罪致讨。^④九月四日,锡良致电军机处请收回瞻对:

微外连年多事,实缘瞻对番官侵暴川属土司,故议收还,绝其祸本。……微外措处全视三瞻,盖其人雄长于诸番之中,其地错处于川边之内,番情向背,随之转移。而我之沿革损益,莫不因之为重轻,以此计其得失。……失今不治,愈恐难图。^⑤

九月八日,清廷电寄锡良,支持锡良收瞻之议:

应乘此机会将三瞻地方收回内辖,改设官屯,俾资控驭。著有泰、联豫即行割切开导商上,晓以保固川边必应收回瞻对,令将所派番官撤回,毋稍疑贰。兵费仍照前筹给,以示体恤。^⑥

尽管此时锡良筹瞻之议得到清政府的认同和支持,这恰恰是鹿传霖督川时期筹瞻川属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但此时军事行动方亟,筹瞻川属只得暂时搁置。

巴塘战事结束后,清政府随即开始了对里塘桑披寺的用兵。桑披寺之战耗时数月,“大小数十战于冰天雪地之中,绝粮死战”,^⑦直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八日清军方攻克桑披寺。主持前线战事的赵尔丰亦是身心俱疲,不禁发出“但愿蛮民从此革新向化”的感慨。^⑧六月二日,锡良密保指挥川边用兵的赵尔丰,称其“坚忍卓绝,忠勇无伦”。^⑨同月,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奏设川滇边务大臣:

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甚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也。……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藏、边、滇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⑩

显见,锡良此举不仅出于强化川边藏区管理的目的,更在于使川、滇、边、藏声气相通,所谓“固川滇之门户”、“保西藏之藩篱”。^⑪

川滇边务大臣之设揭开了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新篇章。首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下定决心将此前提议的改土归流付诸实施。在锡良、赵尔丰主导下,各地改土归流章程纷纷出台,如《巴塘善后章程》43条,《乡城改土归流章程》39条等。川边改土归流的全面铺开,为筹瞻川属提供了良好的时代环境。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尔丰率军征剿德格,瞻对欲暗调马队支援,赵尔丰派傅嵩焘率

① 鹿传霖《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筹瞻奏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印制,第10页。

② 《致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13册,甲374—21,馆藏。

③ 《致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12册,甲374—21,馆藏。

④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12册,甲374—21,馆藏。

⑤ 《锡良致电军机处》,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四日,《锡良督川时办理泰里巴塘事宜电稿》第10册,甲374—144,馆藏。

⑥ 《奉旨著割切开导保固川边》,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八日,2—03—12—031—05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⑦ 《赵尔丰致电锡良绰哈布陈报乡城平定请奖出力员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78页。

⑧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17册,甲374—22,馆藏。

⑨ 锡良《密保建昌道赵尔丰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日,《锡良遗稿》,第595页。

⑩ 《锡良绰哈布奏设川滇边务大臣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90页。

⑪ 《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初三日)。

兵赴昌泰,并电政府“拟逐藏官,收回瞻对”,然而清政府因担心另生枝节而议缓收瞻。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丰又致电政府收瞻,清政府“议以十余万金与藏赎”,然藏人不遵,“反藉外人以为恫吓”,清廷亦盲于情事,恐酿中外交涉。直到宣统三年六月,此时赵尔丰已出任四川总督,不经奏准而直接率兵进入瞻对,“逐其官、抚其民、收其地,召集百姓公议改良赋税之则,设官治理”。^①瞻对问题终以收归川属、改土归流告终。

结 语

长期以来,清政府昧于大势,对川边藏区的管理缺乏应对危机的决断力和自信心。以本文讨论的瞻对为例,同治四年瞻对赏藏后清政府对于瞻对问题被动应付,外患严重时倾向收瞻,反之则处之泰然、无所作为,是以1896年鹿传霖筹瞻川属终被清廷否定“番官并无叛逆情形……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行收回其地?”^②正如有论者言,鹿传霖筹瞻川属之所以功败垂成,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鹿传霖缺乏与清政府有效沟通,致使清政府“瞻前顾后”,“廷议数变,卒使全案功亏一篑”。^③

进入新政时期,中国西南边疆危急进一步加剧。英国逼签《拉萨条约》后,清政府终于改变此前反对筹瞻川属之意,谕令锡良、有泰、凤全等讨论筹瞻。但初入四川的锡良对川边局势了解有限,加之鹿传霖筹瞻川属失败的前车之鉴,对于应否筹瞻川属态度并不明朗,而有泰、凤全意见相左,终致筹瞻无功。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事发后,锡良主导下开始大举用兵巴塘,此时瞻对藏官则直接出兵干预巴塘事务。锡良深切意识到瞻对藏官“只知有藏卫,不知有国家”,因此在巴塘战事结束后借兵事之利一方面筹划川边改土归流方案,一方面转而极力主张筹瞻川属,并将上述举措以及川边内外危势及时奏报清政府,避免了出现鹿传霖筹瞻川属由于缺乏与清廷有效沟通而遭到后者反对的结局。可以说,锡良筹瞻川属态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政时期西南边疆的历史生态,即瞻对藏官已成为与中央政府关系日渐疏离的西藏地方政府干预川边事务的开路先锋,筹瞻川属成功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川边秩序,也关乎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力。此时筹瞻川属虽然终于成为央地政府一致认同的施政举措,但又因川边战事未靖而暂时搁置。1906年6月清军攻克桑披寺,之后锡良奏准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改土归流大幕拉启的时代背景下,赵尔丰最终在1911年将瞻对收归川属。

从清末瞻对问题的连续性审视,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虽未实现,但以锡良为首的地方官员关于筹瞻川属的谋划和举措,客观上在鹿、赵之间构筑了联系的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同时不能忽视的是,锡良主导的川边战事不仅强化了清政府对川边的控制,对西藏地方政府也产生极大震慑,正所谓川边“数千里顽梗不化之俦怀畏同深”,藏中“亦渐有悔祸之心”^④,这就为赵尔丰筹瞻川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尽管赵尔丰主导的筹瞻川属亦是一波三折,但其始终坚持不懈,终将瞻对收归川属,其功固不得不溯至锡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3CZS05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批特别资助项目(批准号:2013T6023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戴海斌)

① 以上引文参见傅高林《西康建省记》,第77—78页。

②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初九日)。

③ 参见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年第29期。

④ 《附录赵大臣尔丰原奏边务大概情形折》,姚锡光《筹藏刍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资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正编第39辑,第60页。

Analysis into the Phenomenon of Combating Evil Deities by Scholars in Wuzhong in Mid-Ming Dynasty

WANG Jian

In mid-Ming dynasty, some scholars were prudent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folk belief. These scholars had a complicated network of connections, including some Neo-confucianists and officials out of the region. All these form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cy of combating evil deities when they secured a position out of the region.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scholars' personal network when studying the issue in Ming dynasty.

Social Vicissitudes and Regulation of Corpse Inspection of Homicide Case in Jiangnan of Qing Dynasty

FENG Xian - liang

The homicide cas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n the executive work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Qing dynasty. The law requires all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of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levels to be prudent and do the inquisition and survey in time when there was relevant lawsuit.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inquest officials' action was opposite to the institutional norm in homicide cases. The large-scale regulation work appeared after the war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1851 - 1864), and showed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Recovering Zhandui(瞻对) during the Period of Xi Liang Governing Sichuan

PAN Chong

The Qing Government rewarded Zhandui to Tibet in 1866, thirty years later Sichuan Governor Lu Chuanlin began to recover Zhandui but failed. In 1903, the Qing Government changed previous idea and ordered Sichuan Governor Xi Liang, Tibet Amban You Tai(有泰) and his Deputy Feng Quan(凤全) to counsel recovering Zhandui, but they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In 1905, Tibetan officials began to interfere Chuanbian(川边) affairs. Xi Liang advocated to recover Zhandui but was occupied by the continued military conflict, until 1906, he reported to set Border Chairman of Chuan and Dian. Finally, Zhao Erfeng recovered Zhandui in 1911.

On the Origin of State Theory as Recorded in Qing Yi Newspaper

CHENG Hong - lei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texts of State Theory by different authors or translato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Qing Yi Bao version of State Theory was not plagiarized from the version by Wuqibingzhi. It was in fact based on the version of two Japanese translators and completed after referring to the version of Wuqipingzhi. For the translator of the Qing Yi Bao vers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besides Liang Qichao, Luo Pu might have also played the role as an instructor.

Public Opinions in the New Deal in Late Qing Dynasty—Focusing on Shang Xian Tang

RAO Ling - yi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Shang Xian Tang the folk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opinions.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transmitter and scope. The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position, speeches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folk's opinions dominated by missionaries, scholars and gentle merchants, whi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ssionary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Divergence of Civic Virtue: A Study on the Public Ethic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DUAN Lian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forged a particular kind of morality centered on util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However, due to th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moral, divergences in this new morality also eroded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 could the Republic create a new collective identity as its ethical foundati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examin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orality and ethics, individual and nation, and "good" and "right" in ways distinct from the history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West, shaping a unique form of intellectual modernity in China.